

查瑞波, 黄悦, 杜书滢, 等. “软-硬”关系框架下城市型目的地出入境旅游响应路径——基于 1997—2019 年中国香港特区数据的组态分析 [J]. 地理科学, 2022, 42(10): 1788-1798. [Zha Ruibo, Huang Yue, Du Shuying et al. The response path of inbound and outbound tourism of urban destinations under inter-regional relationship influence framework: Configuration analysis based on the data of Hong Kong, China, from 1997 to 2019.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22, 42(10): 1788-1798.] doi: 10.13249/j.cnki.sgs.2022.10.011

“软-硬”关系框架下城市型目的地 出入境旅游响应路径 ——基于 1997—2019 年中国香港特区数据的组态分析

查瑞波, 黄悦, 杜书滢, 王培涵, 许进鎔

(福建师范大学文化旅游与公共管理学院/智慧旅游福建省高校重点实验室/
福建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福建 福州 350117)

摘要: 选取 1997—2019 年中国香港特区数据, 使用定性比较分析(QCA)方法对出入境旅游流产生路径的前因条件以及结果条件进行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 ① 在路径数量上, 虽持续简化, 但是仍然具有复杂性; ② 在核心条件中, 所有的单因素均不构成影响的核心条件, 中国香港出入境旅游流路径受到多因素组合作用; ③ 在前因条件中, “软-硬”关系影响存在差异, 硬实力关系对高出入境旅游流起主导作用, 软实力关系则对非高出入境旅游流作用较大; ④ 在路径国家(地区)中, 高和非高出入境旅游流存在显著地区差异; ⑤ 在时间层面上, 阶段 1 与阶段 2、阶段 3 路径差异较大, 表明时间节点的分割事件对中国香港出入境旅游的影响不同。

关键词: 区域间“软-硬”关系影响框架(IRRIF); 定性比较分析(QCA); 出入境旅游流; 城市型目的地

中图分类号: F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690(2022)10-1788-11

在全球出入境旅游网络中, 一些国际化城市目的地具有重要结点地位, 但这些目的地一般经济体量和腹地规模小, 出入境旅游发展脆弱性高, 对国家(地区)间关系的变化较敏感。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下文简称“中国香港”)作为东西方文化的汇聚交流之地、世界著名的自由港, 长期以来是全球热门的城市型旅游目的地之一。中国香港回归 20 多年来, 依托庞大的中国内地市场, 入境旅游人次从 1997 年的 1 127 万攀升至 2019 年的 5 590 万, 是当年中国香港人口总量的 7.5 倍, 增幅高达 396%; 出境旅游人次从 1997 年的 4 760 万攀升至 2019 年的 9 470 万, 是当年中国香港人口总量的 12.6 倍, 增幅达 99%, 出游其他国家(地区)的旅游支出达

到 268 亿美元^[1]。新时期中国“双循环”政策下, 中国香港作为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对外窗口, 与大型旅游目的地相比, 具有功能上的特殊性与文化上的复杂性, 更易受疫情、经济危机等区域或全球事件影响, 并且区域间关系变化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出入境旅游流的变化。基于此, 本文认为研究区域间关系对中国香港出入境旅游流的影响路径机制有助于丰富城市型目的地出入境旅游流影响研究; 对比高和非高出入境旅游流组态路径的差异, 对明晰区域间关系变化对城市型目的地出入境旅游流的影响路径机制具有重要理论价值。此外, 研究对中国香港制定符合自身区域关系特点的出入境旅游发展战略和政策, 以及提升其作为中国“双循环”桥梁城市

收稿日期: 2022-03-20; **修订日期:** 2022-06-09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201267, 42001170)、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8YJCZH007, 20YJCZH237)、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2017YFC0505403)、福建省教育厅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JAS180072)、国家留学基金项目(202108350051)资助。[Foundation: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42201267, 42001170),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Foundation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China (18YJCZH007, 20YJCZH237), National Key R&D Program (2017YFC0505403), Education Research Project for Young and Middle-aged Teachers of the Education Department of Fujian Province (JAS180072), China Scholarship Council Program (202108350051).]

作者简介: 查瑞波(1989—), 男, 陕西咸阳人, 副教授, 硕导, 主要研究方向为旅游地理与区域可持续发展。E-mail: rbzha@fjnu.edu.cn

通讯作者: 黄悦。E-mail: Hyueyue@163.com

的全球竞争力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出入境旅游流影响研究集中在市场分析^[2]、经济贸易^[3]、影响因素^[4,5]等方面。国外学者以大型出入境旅游目的地^[6]为例发现出入境旅游之间存在非对称因果关系,究其原因,遥远的目的地距离难以吸引游客出境旅游^[7],进出口贸易与出入境旅游之间的互动关系^[3]导致旅游引发贸易,贸易推动旅游;而社会因素^[8]、政府政策环境^[9]、汇率变动^[10]有助于解释出入境旅游市场的大部分波动现象。考虑到出入境旅游特殊的国际属性,国际旅游与国际关系存在密切联系^[11],国际关系的危机或利好事件会影响国际旅游^[12],非正式属性的旅游外交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协调两国关系^[13]。定性比较分析方法主要应用于社会学^[14]、管理学^[15]等领域,被引入旅游地理学后,研究聚焦于乡村旅游^[16,17],在出入境旅游^[18]方面研究甚少。综上所述,目前出入境旅游流影响研究存在以下问题:①多为出境或入境的单向研究,将出入境旅游流整合探究的研究较少,且缺乏影响路径关联性及异质性研究;②影响研究主要从单一影响因素层面展开,较少从多维度视角下对影响因素进行探究;③研究案例地多为中国内地(大陆)或省域、城市群,以中国香港为代表的城市型目的地研究较少^[19],且较少从全球视域进行探讨。④研究手段较单一,主要为经济学^[20]、统计学^[21]研究方法,缺乏新兴研究方法引入。因此,研究选取城市型目的地中国香港为案例地,对出入境旅游流的动态性影响因素组合采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测度,以期揭示区域间关系对城市型目的地出入境旅游流结构和路径的影响机制。

1 理论框架与假设

1.1 区域间“软-硬”关系影响框架

基于交叉学科视角的类比研究,查瑞波等^[22]发

现社会学人际关系研究中的手机通讯流与旅游地理学中出入境旅游流具有相似性,在已有人际关系分层差序格局理论^[23-25]基础上,建构了出入境旅游关系圈(OITRC)理论模型^[22],并进行类比推演,提出人际关系(Inter-rersonal relationship,简称 IPR)对手机往来通讯流的影响与区域间“软-硬”关系(Inter-regional relationship,简称 IRR)对出入境旅游流的影响具有相似性(图 1)。人际关系理论将其影响因素划分为交频维、间距维、基缘维、价值维 4 个维度。其中,交频维指交往双方频率对人际关系的影响,与经贸因素^[3,21]对于出入境旅游的影响逻辑相似,经贸因素即旅游客源地与目的地之间的经贸往来的依赖程度;间距维指交往双方相处距离远近对双方关系的影响,与地理因素^[6]对出入境旅游的影响逻辑相似,均指地理距离的远近;基缘维指构成人际关系的血缘、地缘、文缘等,与文化因素^[4]对出入境旅游的影响逻辑相似,文化因素即旅游客源地与目的地之间文化的相似性与差异性;价值维指价值意识和制度观念对形成良好人际关系的影响,与制度因素^[5]对出入境旅游的影响逻辑相似,制度因素即旅游客源地与目的地之间社会制度与治理能力的差异。除此之外,考虑到游客作为旅游活动的主体,全球各地区人口体量的巨大差异,特引入人口因素^[26];签证是出入境旅游准入、准出的通行证,考虑到其对出入境旅游特有的决定性作用,引入签证因素^[27]。参考国际关系理论^[28]将区域间关系划分为两大类,一是硬实力关系,二是软实力关系。所谓硬实力关系指客源地与目的地之间硬实力联系的相关因子,即两个区域间物化要素所构成的实力关系,例如经济实力、硬件设施等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力量,地理因素、经贸因素、人口因素都属于此范畴;软实力关系指客源地与目的地之间软实力维度联系的相关因子,即两个区域间非物化要素所构成的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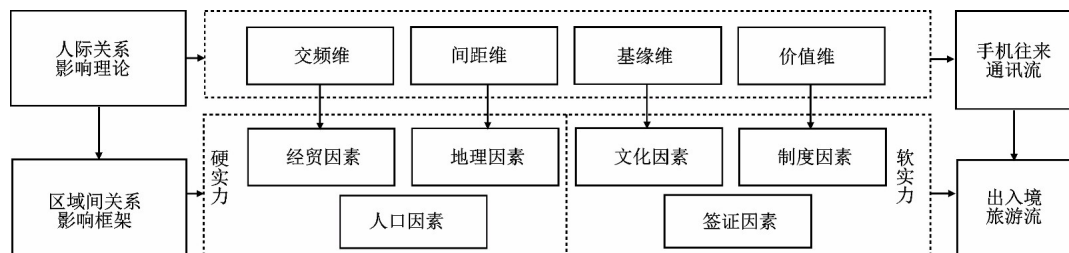


图 1 人际关系影响理论到区域间“软-硬”关系影响框架的类比推演

Fig.1 The analogy deduction from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impact theory to inter-regional relationship influence framework

力关系,例如文化价值观念、社会制度等有关发展潜力和感召力的因素,文化因素、制度因素、签证因素属于此范畴。基于以上理论,研究构建区域间“软-硬”关系影响框架(Inter-regional relationship influence framework, IRRIF)研究中国香港出入境旅游流的响应路径。

1.2 IRRIF 与出入境旅游流的路径关系假设

已有研究表明,多种因素对出入境旅游流的作用规律存在相似性,但对不同出入境旅游市场主体的作用方式存在不同。距离衰减定律仍然在出入境旅游市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29],贸易与出入境旅游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推拉模型^[3];个体人口特征^[26]、签证便利度^[27]、文化差异^[4]、制度距离^[5]也会不同程度的影响旅游者目的地的选择;旅游时空环境情景不同,影响出入境旅游的因素会随之发生改变^[30]。因此,影响出入境旅游流的原因并不局限于单一因素,而是受到多重组合因素的共同作用,不同因素组合则可能导致出入境旅游流产生差异。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假设 1:中国香港高和非高出入境旅游流在组态路径上存在差异;假设 2:影响中国香港高和非高出入境旅游流的前因条件存在差异;假设 3:中国香港出入境旅游流受区域间关系中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方法

定性比较分析(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QCA)认为案例是由原因条件组成的整体,关注条件组态与结果间复杂的因果关系^[15],通过使用布尔代数与集合论思想对案例进行比较研究。该方法有 3 种使用形式:清晰集(csQCA)、多值集(mvQCA)和模糊集(fsQCA),本文采用模糊集方法的原因如下:① fsQCA 支持等定性和主张因果非对称性^[17],即不同组合可能导致相同结果,结果的出现和不出现可能需要不同解释。采用该方法能发掘诸要素联合对中国香港出入境旅游流形成的非线性关系。② 本研究的因果变量在程度水平上属于连续型变量,fsQCA 对于处理连续变量更加严格和精确,能更加充分地捕捉到前因条件变化而带来的影响。③ 考虑到条件变量不需要进行 0 或 1 的二元赋值^[16],采用 fsQCA 进行赋值定级细分,解释更具合理性。因此,研究借助 fsQCA3.0 软件实现,选取地理因素、经贸因素、人口因素、签证因素、文化因

素、制度因素 6 个前因条件,符合应将模型限制在 7 个前因条件之内的研究建议^[31];案例数量 100 个,符合 QCA 方法样本数量要求^[32];使用直接校准法进行校准,设定案例样本描述性统计的上四分位数(75%)、中位数(50%)、下四分位数(25%)分别作为 1(完全隶属)、0.5(交叉点)、0(完全不隶属)3 个锚点校准原始条件和结果数据;阈值设置一致性大于 0.80,不一致性比例衰减(Proportional Reduction in Inconsistency, PRI)大于 0.75,符合研究建议,以避免“同时子集关系”^[33];稳健性检验采用变动一致性阈值的方法,我们将一致性阈值由原先的 0.80 提升至 0.85,结果显示,调整参数并没导致组态发生实质性变化,分析结果具有稳定性和可靠性;结果的呈现同主流研究保持一致^[34],使用中间解、辅助简约解。

2.2 数据来源

1) 时段划分。在时间范围上,研究选取了从中国香港回归的 1997 年至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前的 2019 年这 23 a 的数据,并划分了 3 个时间阶段:阶段 1,1997 年中国香港回归至 2003 年中国内地赴港“自由行”;阶段 2,2004 年中国香港开放“自由行”政策后至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阶段 3,2009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至 2019 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前。通过对比这 3 个阶段来分析近年来区域间关系对中国香港出入境旅游流影响路径的时空演变规律。

2) 变量选取。出入境旅游流数据来源于欧睿数据库(<https://www.euromonitor.com>),选择数据相对完整且代表性较高的 100 个国家(地区)作为案例地。IRRIF 中硬实力关系和软实力关系变量选取如下,硬实力关系包括:① 地理因素(DIST):采用 CEPII 网站(http://www.cepii.fr/cepii/en/bdd_modele/bdd.asp)中案例地与中国香港之间的地理距离指数,选择代表双方首都的球面距离 distcap 数据;② 经贸因素(ECON):采用世界银行(<https://databank.worldbank.org/home.aspx>)中各国家(地区)的进出口和 GDP 数据,通过计算案例地与中国香港的双向贸易依存度获得;③ 人口因素(POP):本文采用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和人口总量数据(<https://hdr.undp.org/>),通过衡量案例地与中国香港的平均人类发展指数和平均人口总量比值的乘积之比获得。软实力关系包括:④ 签证因素(VISA):通过中国香港入境处网站(<https://www.immd.gov.hk/hkt/index.html>)和实地调研取得案例地与中国香港间双边签

证政策数据,将签证便利度进行定性分析划分为 6 级并量化获得(禁止=0、申请=1、落地或电子=2、免 30 d 内=3、免 30~90 d=4、免 90 d 以上=5);⑤ 文化因素(CULT):基于 Hofstede 网站(<https://www.hofstede-insights.com/>)上文化的权力、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男性度与女性度、不确定性规避、长期导向与女性导向、放纵与克制共 6 个维度,采用 KSI (Kogut&Singh Index)指数公式^[35]衡量;⑥ 制度因素(SYST):本研究基于全球治理指标体系 WGI (<http://info.worldbank.org/governance/wgi>)中反映案例地公民政治话语权、政治稳定、政府效能、监管质量、法律规则以及控制腐败 6 个维度指标,同样采用 KSI 指数公式^[35]衡量。

3 IRRIF 对中国香港出入境旅游流的路径影响分析

3.1 一致性分析

中国香港高和非高出入境旅游流路径总体解与单个解的一致性均大于可接受的最低标准 0.75,说明组态模型结果具有较强的可靠性。在可能形成的 64 条路径中,不同阶段中存在多种组合路径,充分性条件的特定组合路径约为 3~9 条。一般而言,一致性大于 0.9 被认为是必要性的^[34],研究中所有必要条件一致性分析均未超过 0.9,意味着所有单因素均不构成中国香港高和非高出入境旅游流的核心条件。中国香港出入境旅游流路径不是由某一个前因条件单独导致,而是多种条件变量相互作用多重并发因果关系,不同因素需要进行条件组合才能发挥作用。因此,需要进行组态分析。

3.2 高出入境旅游流组态路径分析

1) 高入境旅游流。中国香港高入境旅游流路径(表 1)阶段 1~3,影响高入境旅游的路径简化,由 7 条路径减少为 5 条路径再减少为 4 条路径。3 个阶段中 R1 路径组态结构表现相同,最为稳定,且覆盖度最高,而其它路径唯一覆盖度均小于 0.05,说明 R1 路径是高入境旅游流的主要组合路径。高入境旅游流受到经贸因素、签证因素存在和制度因素缺失的影响,其中,经贸因素、制度因素为核心条件。此外,阶段 2 中 R4、R5 路径与阶段 3 中的 R2、R4 路径组态结构相同,阶段 1 中 R2、R3 路径与阶段 2 中 R2、R3 组态结构相似,路径变化体现在硬实力关系中的地理因素和人口因素上。阶段 1 的中

经贸因素的存在和地理、制度因素的缺失较为重要,软实力关系相对于硬实力关系而言,影响较小。阶段 2 中,经贸因素的存在为必要条件,软实力关系起辅助作用。阶段 3 中,经贸因素的存在仍为必要条件,人口因素的存在作用增强,硬实力关系总体作用较为突出,软实力关系仍然起到辅助性作用。总体来看,经贸因素的存在和制度因素的缺失在 3 个阶段中表现较为稳定,可见经贸因素和制度因素对高入境旅游影响强烈。

2) 高出境旅游流。与高入境旅游流的作用路径数量变化一致,随着时间的流逝,高出境旅游流的路径简化(表 2),由 9 条路径减少为 7 条路径再减少为 5 条路径。3 个阶段中,路径国家(地区)覆盖最高的均为 R1 路径,阶段 3 中 R1 唯一覆盖度最高,达到 0.300。阶段 1 中 R8 路径与阶段 2 中 R7 路径组态结构相同,案例地国家同为约旦,表明约旦在 1997—2008 年入境中国香港旅游的影响因素未发生变化。阶段 2 中 R1、R2、R4 与阶段 3 中 R1、R2、R3 路径组态结构相同,但在不同阶段中覆盖到的国家(地区)略有不同,路径 R4、R5 较之发生轻微变化。3 个阶段变化中发现阶段 2 与阶段 3 的组态路径组态结构较为相似,而阶段 1 与其相差较大。值得注意的是,高出境旅游流路径与高入境旅游流路径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相似性,表现为高出境旅游流阶段 2 与阶段 3 中的 R1 路径与高入境旅游流 3 个阶段中的 R1 路径相同。总体来看,影响高出境旅游流的前因条件为经贸因素的存在,随着时间变化,地理因素、文化因素的影响在减弱,而人口因素、制度因素的影响增强,影响中国香港游客的高出境旅游的主导因子是硬实力关系,经贸因素起主导作用,人口因素的作用愈加强烈。

3.3 非高出入境旅游流组态路径分析

1) 非高入境旅游流。QCA 方法能够识别出“非高”结果的条件构型,发现不对称关系^[15]。非高入境旅游流(表 3)路径数量从阶段 1 中 6 条路径到阶段 2 中 5 条路径再到阶段 3 中 3 条路径,持续减少,稳定性增强。3 个阶段中,组态路径相似性极低,仅阶段 2 中 R2 路径与阶段 3 中 R3 路径组态结构相同,其他路径在前因条件的组合及存在和缺失上存在明显差异。路径国家(地区)覆盖最高的是阶段 3 的 R1 路径,覆盖了 20 个国家(地区),路径表现为经贸、签证因素的缺失与文化、制度因素的存在。影响非高入境旅游流的主要前因条件是经贸因

表 1 1997—2019 年高入境旅游流路径

Table 1 High inbound tourism flow path from 1997 to 2019

	阶段1: 1997—2003年路径							阶段2: 2004—2008年路径					阶段3: 2009—2019年路径			
	R1	R2	R3	R4	R5	R6	R7	R1	R2	R3	R4	R5	R1	R2	R3	R4
<i>DIST</i>	○	⊗	⊙	⊗	●	⊗	●	○	●	⊙	●	⊗	○	●	●	⊗
<i>ECON</i>	●	●	●	○	●	⊙	●	●	●	●	●	●	●	●	●	●
<i>POPU</i>	○	●	●	⊙	⊙	⊙	●	○	●	⊙	●	●	○	●	●	●
<i>CULT</i>	○	○	⊙	●	●	⊙	⊗	○	○	⊙	●	●	○	●	⊗	●
<i>SYST</i>	⊗	○	⊙	⊙	⊙	⊗	●	⊗	○	⊙	⊙	●	⊗	⊙	●	●
<i>VISA</i>	●	●	○	●	○	⊗	⊗	●	●	○	○	⊙	●	○	○	⊙
<i>RC</i>	0.532	0.261	0.213	0.171	0.132	0.058	0.070	0.524	0.262	0.153	0.160	0.082	0.501	0.145	0.083	0.077
<i>UC</i>	0.225	0.040	0.017	0.042	0.014	0.019	0.025	0.215	0.024	0.016	0.011	0.039	0.347	0.011	0.022	0.040
<i>U</i>	0.885	0.934	0.984	0.869	0.888	0.901	0.853	0.883	0.902	0.865	0.990	0.911	0.872	0.980	0.860	0.853
<i>OC</i>	0.702							0.619					0.578			
<i>OU</i>	0.863							0.862					0.851			
路径 国家 (地 区)	R1: 英国、中国台湾、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瑞士、德国、西班牙、法国、意大利、日本、荷兰、美国、挪威、瑞典、丹麦、韩国、波兰、希腊 R2: 日本、韩国、土耳其、波兰、中国台湾、澳大利亚、埃及、德国、希腊 R3: 韩国、波兰、日本、中国台湾、马来西亚、泰国、德国、希腊 R4: 塞浦路斯、中国澳门、瑞典、挪威、丹麦、奥地利 R5: 新西兰、波多黎各、比利时 R6: 克罗地亚 R7: 阿根廷、巴西							R1: 比利时、加拿大、德国、日本、荷兰、瑞典、美国、澳大利亚、奥地利、西班牙、法国、英国、挪威、中国台湾、瑞士、韩国、丹麦、希腊、意大利、波兰 R2: 美国、加拿大、西班牙、阿根廷、巴西、法国、英国、墨西哥、委内瑞拉、意大利、荷兰、智利 R3: 阿联酋、芬兰、以色列、新加坡、捷克共和国、希腊、匈牙利 R4: 美国、南非、英国、荷兰 R5: 沙特阿拉伯					R1: 德国、日本、比利时、加拿大、瑞士、法国、英国、荷兰、瑞典、美国、澳大利亚、西班牙、韩国、挪威、奥地利、波兰、阿联酋、丹麦、意大利、马来西亚 R2: 美国、南非、英国、荷兰 R3: 巴西、阿根廷、秘鲁 R4: 沙特阿拉伯、埃及、伊拉克			

注: R1~R7分别为作用路径1~7; *DIST*为地理因素; *ECON*为经贸因素; *POPU*为人口因素; *CULT*为文化因素; *SYST*为制度因素; *VISA*为签证因素; ●为核心条件存在; ⊗为核心条件缺失; ●为边缘条件存在; ⊙为边缘条件缺乏; ○为条件可存在可缺失; *RC*为原始覆盖度; *UC*为唯一覆盖度; *U*为一致性; *OC*为总体覆盖度; *OU*为总体一致性。

素的缺失和制度因素的存在,与高入境旅游流的主要前因条件相反。总体来看,软实力关系起到主导作用,硬实力关系对非高入境旅游流作用甚微。不同时间阶段中,经贸因素的缺失具有共性,在多条路径中没有发生变化,制度因素的存在较为稳定,文化因素的影响有增强趋势。

2) 非高出境旅游流。非高出境旅游流的组态路径(表 4)总体趋势仍在减少,从阶段 1 中 8 条路径到阶段 2、阶段 3 的 5 条路径。3 个阶段中,路径国家(地区)覆盖最高的是阶段 2 的 R1 路径为 0.147。阶段 2 中 R1、R4 路径和阶段 3 中 R1、R5 路径组态结构相同,分别表现为经贸、人口、制度因素的缺失和文化因素的存在以及地理、人口、文化、制度因素的存在和签证因素的缺失。其中,阶段 2 中 R1、R4 路径分别覆盖到了 7 个和 10 个国家(地区),阶段 3 中 R1、R5 路径则分别覆盖到了 8 个

和 12 个国家(地区),覆盖度较高。总体来看,软实力关系仍发挥着主导作用,影响非高出境旅游流的前因条件中经贸因素的缺失和签证因素的缺失极为稳定,制度因素的影响在增强,文化因素作用减弱,由存在转变为可存在可不存在。

综上所述,1997—2019 年,中国香港高和非高出入境旅游流在组态路径上存在不同的路径,表现在不同时期阶段的路径数量及组态路径的结构上,验证了本文提出的假设 H1 成立;在构成结果的前因条件中,影响中国香港高和非高出入境旅游流的前因条件存在差异,表现为影响高出入境旅游流的前因条件多为地理因素、经贸因素等硬实力因素,影响非高出入境旅游流的前因条件多为文化因素、签证因素等软实力因素,同时验证了本文提出的假设 H2、假设 H3 成立。

表 2 1997—2019 年高出境旅游流路径

Table 2 High outbound tourism flow path from 1997 to 2019

	阶段1: 1997—2003年路径									阶段2: 2004—2008年路径							阶段3: 2009—2019年路径				
	R1	R2	R3	R4	R5	R6	R7	R8	R9	R1	R2	R3	R4	R5	R6	R7	R1	R2	R3	R4	R5
<i>DIST</i>	○	●	●	⊗	○	●	●	⊗	⊗	○	●	⊗	⊗	●	●	⊗	○	●	⊗	○	●
<i>ECON</i>	●	●	●	●	●	○	●	●	●	●	●	○	●	●	○	⊗	●	●	●	●	●
<i>POP</i>	●	⊗	⊗	●	⊗	●	●	●	●	○	●	●	●	●	●	●	○	●	●	●	●
<i>CULT</i>	●	●	○	⊗	●	⊗	○	●	●	○	○	⊗	○	●	●	●	○	○	○	⊗	●
<i>SYST</i>	●	●	●	○	●	●	●	⊗	⊗	●	○	●	●	⊗	●	⊗	●	○	●	●	●
<i>VISA</i>	○	○	●	●	●	●	●	⊗	●	●	●	●	●	○	●	⊗	●	●	●	●	○
<i>RC</i>	0.217	0.138	0.160	0.231	0.156	0.090	0.127	0.045	0.054	0.519	0.262	0.228	0.193	0.136	0.084	0.052	0.532	0.279	0.226	0.206	0.092
<i>UC</i>	0.086	0.013	0.018	0.105	0.025	0.013	0.041	0.013	0.014	0.200	0.020	0.071	0.138	0.001	0.007	0.014	0.300	0.031	0.036	0.000	0.000
<i>U</i>	0.852	0.899	0.876	0.908	0.855	0.905	0.918	0.861	0.958	0.888	0.915	0.879	0.866	0.865	0.862	0.859	0.922	0.940	0.850	0.871	0.938
<i>OC</i>	0.564									0.800							0.768				
<i>OU</i>	0.819									0.823							0.884				
路径	R1: 俄罗斯、中国内地(大陆)、印度尼西亚、印度、伊朗、土耳其、菲律宾、阿根廷、巴基斯坦、巴西									R1: 加拿大、德国、英国、日本、荷兰、瑞典、澳大利亚、比利时、瑞士、法国、美国、奥地利、挪威、西班牙、中国台湾、韩国、丹麦、希腊、意大利、波兰							R1: 德国、日本、比利时、加拿大、瑞士、法国、英国、荷兰、瑞典、美国、澳大利亚、西班牙、韩国、挪威、奥地利、波兰、阿联酋、丹麦、意大利、马来西亚				
国家	R2: 新西兰、波多黎各、比利时									R2: 美国、加拿大、西班牙、阿根廷、巴西、墨西哥、法国、英国、委内瑞拉、意大利、荷兰、智利							R2: 美国、阿根廷、巴西、加拿大、西班牙、墨西哥、法国、英国、智利、意大利、荷兰				
地区	R3: 爱尔兰、瑞士、新西兰、比利时、葡萄牙									R3: 新加坡、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芬兰、以色列、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共和国、希腊、克罗地亚							R3: 伊朗、中国内地(大陆)、印度尼西亚、印度、泰国、沙特阿拉伯、土耳其、菲律宾、俄罗斯、埃及、巴基斯坦、伊拉克、孟加拉国				
	R4: 韩国、土耳其、波兰、日本、中国台湾、德国、希腊									R4: 印度尼西亚、中国内地(大陆)、伊朗、俄罗斯、印度、沙特阿拉伯、泰国、巴基斯坦、菲律宾、土耳其							R4: 伊朗、中国内地(大陆)、印度尼西亚、印度、泰国、土耳其、菲律宾、俄罗斯、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秘鲁				
	R5: 丹麦、瑞典、挪威、新西兰、奥地利、比利时									R5: 美国、南非、英国、荷兰							R5: 巴西、阿根廷、秘鲁				
	R6: 秘鲁、厄瓜多尔、巴西									R6: 委内瑞拉、墨西哥、危地马拉											
	R7: 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墨西哥、巴西									R7: 约旦											
	R8: 约旦																				
	R9: 澳大利亚																				

注: R1~R9 分别为作用路径 1~9; *DIST* 为地理因素; *ECON* 为经贸因素; *POP* 为人口因素; *CULT* 为文化因素; *SYST* 为制度因素; *VISA* 为签证因素; ● 为核心条件存在; ⊗ 为核心条件缺失; ● 为边缘条件存在; ⊗ 为边缘条件缺乏; ○ 为条件可存在可缺失; *RC* 为原始覆盖度; *UC* 为唯一覆盖度; *U* 为一致性; *OC* 为总体覆盖度; *OU* 为总体一致性。

4 讨论及结论

4.1 讨论

本文研究基于 IRRIF 对小型城市型目的地出入境旅游流路径影响的分析进行以下讨论,硬实力关系在影响高出入境旅游流中均起到主导的作用。其中,经贸因素起着重要作用,路径表明中国香港吸引案例地游客入境旅游的原因在于客源地经济实力强,地理临近,人口特征的大体量与高质量,社会制度存在优势,而且中国香港曾受英国的殖民统治,其底层文化里东西方文化交融,旅游文化吸引力强;

案例地吸引中国香港游客出境旅游的优势在于案例地国家(地区)的经济发达,文化与中国香港存在着差异,签证政策便于中国香港游客进入。高入境和高出境路径国家(地区)的总体覆盖度比较高,超过案例地数量的 1/2,这些地区主要分布在地理临近且签证便利的周边地区、文化相似的欧盟地区、经济发达的美洲地区。在影响中国香港非高出入境中软实力关系发挥主导作用,经贸因素的缺失具有共性,路径表明中国香港吸引案例地游客入境旅游弱的原因因为案例地距中国香港地理较远,经济上较之落后,人口体量小导致旅游市场小,文化及政治社

表 3 1997—2019 年非高入境旅游流路径

Table 3 Non-high inbound tourism flow path from 1997 to 2019

	阶段1: 1997—2003年路径						阶段2: 2004—2008年路径					阶段3: 2009—2019年路径		
	R1	R2	R3	R4	R5	R6	R1	R2	R3	R4	R5	R1	R2	R3
<i>DIST</i>	●	○	●	○	●	●	●	●	○	●	○	○	●	●
<i>ECON</i>	○	○	○	○	○	○	○	○	○	○	○	○	○	○
<i>POPU</i>	○	○	○	●	○	●	○	○	○	●	●	○	○	○
<i>CULT</i>	○	●	○	○	○	●	●	○	●	●	○	●	●	○
<i>SYST</i>	●	●	●	●	○	●	○	●	●	●	●	●	○	●
<i>VISA</i>	○	○	●	○	●	●	○	○	○	○	○	○	○	○
<i>RC</i>	0.238	0.367	0.170	0.133	0.142	0.116	0.217	0.240	0.312	0.156	0.080	0.415	0.158	0.230
<i>UC</i>	0.015	0.151	0.025	0.043	0.073	0.026	0.025	0.044	0.109	0.051	0.048	0.235	0.087	0.050
<i>U</i>	0.912	0.917	0.924	0.854	0.865	0.897	0.906	0.931	0.941	0.943	0.868	0.905	0.873	0.950
<i>OC</i>	0.853						0.483					0.553		
<i>OU</i>	0.702						0.903					0.882		
路径国家 (地区)	R1: 萨尔瓦多、中非共和国、贝宁、多米尼加共和国、 苏里南、卢旺达、牙买加、伯利兹、赞比亚 R2: 埃塞俄比亚、伊拉克、卢旺达、马里、格鲁吉亚、 布基纳法索、多米尼加共和国、吉尔吉斯共和国、白 俄罗斯、亚美尼亚、贝宁、摩尔多瓦、阿尔巴尼亚、 阿塞拜疆、加纳、乌克兰、挪威、苏里南、蒙古、阿尔 及利亚 R3: 厄瓜多尔、赞比亚、津巴布韦、牙买加、伯利兹、 坦桑尼亚 R4: 埃塞俄比亚、越南、伊拉克、乌克兰、孟加拉国 R5: 伯利兹、牙买加、乌拉圭、卢森堡、马耳他、斯洛 文尼亚 R6: 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坦桑尼亚、津巴布韦						R1: 贝宁、多米尼加共和国、波多黎各、苏 里南、卢旺达、萨尔瓦多、特立尼达和多巴 哥 R2: 中非共和国、贝宁、多米尼加共和国、 伯利兹、苏里南、卢旺达、牙买加、埃尔萨 尔瓦 R3: 吉尔吉斯共和国、格鲁吉亚、亚美尼亚、 蒙古、贝宁、摩尔多瓦、阿尔巴尼亚、阿塞 拜疆、卢旺达、多米尼加共和国、白俄罗斯、 苏里南、埃尔萨尔瓦多 R4: 乌干达、布基纳法索、加纳、坦桑尼亚、 危地马拉、马里、赞比亚、津巴布韦 R5: 越南、孟加拉国					R1: 马里、贝宁、乌干达、 津巴布韦、赞比亚、布基 纳法索、坦桑尼亚、埃塞 俄比亚、多米尼加共和 国、吉尔吉斯共和国、白 俄罗斯、亚美尼亚、蒙古、 阿塞拜疆、阿尔巴尼亚、 苏里南、摩尔多瓦、卢旺 达、乌克兰、加纳 R2: 哥斯达黎加、波多黎 各、安道尔、冰岛、挪威、 新西兰、特立尼达和多 巴哥; R3: 苏里南、中非共和国、 伯利兹、多米尼加共和 国、贝宁、卢旺达、埃尔 萨尔瓦多、牙买加		

注: R1~R6分别为作用路径1~6; *DIST*为地理因素; *ECON*为经贸因素; *POPU*为人口因素; *CULT*为文化因素; *SYST*为制度因素; *VISA*为签证因素; ●为核心条件存在; ○为核心条件缺失; ●为边缘条件存在; ○为边缘条件缺失; ○为条件可存在可缺失; *RC*为原始覆盖度; *UC*为唯一覆盖度; *U*为一致性; *OC*为总体覆盖度; *OU*为总体一致性。

会制度的差异,以及签证的不便利性;非高出境与非高入境的原因相似,即中国香港与目的地之间存在经济上的差异,又受到签证的不便进入性制约。非高入境和非高出境的总体解覆盖度较高,其覆盖的案例地国家(地区)主要是中亚和非洲的不发达经济体。

中国香港是小型城市型出入境旅游目的地的典型代表,以上研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城市型目的地出入境旅游流响应路径的特征。将本文研究结果与大型旅游目的地^[18]的相关结果对比发现,两者之间相似性与差异性并存。相似性:①小型与大型旅游目的地出入境旅游流的响应路径具有相似性,

高和非高出入境旅游流影响路径表现相似。表明无论是大型目的地还是小型目的地均有其稳定的客源市场,且目的地与客源地市场形成的双向旅游流相互作用明显。②经贸因素是影响大型和小型目的地高出入境旅游流的共同主导因子,表明旅游客源地经济实力优于目的地,以及客源地与目的地之间经贸联系密切等都是带动区域间旅游流产生的重要途径。差异性:①大型目的地旅游流的组态路径较为稳定,即在不同时间节点均呈现出2~3条路径;而小型城市型目的地旅游流的组态路径呈现出从相对复杂向相对简化的演变,呈现3~9条路径,体现了组态路径的主导影响因子从多样化向集中化发展

表 4 1997—2019 年非高出境旅游流路径

Table 4 Non-high outbound tourism flow path from 1997 to 2019

	阶段1: 1997—2003年路径								阶段2: 2004—2008年路径					阶段3: 2009—2019年路径				
	R1	R2	R3	R4	R5	R6	R7	R8	R1	R2	R3	R4	R5	R1	R2	R3	R4	R5
<i>DIST</i>	•	○	○	○	●	◐	•	•	○	●	◐	●	●	○	●	○	•	●
<i>ECON</i>	◐	◐	○	◐	◐	◐	•	◐	◐	◐	◐	○	◐	◐	◐	◐	◐	○
<i>POPU</i>	◐	◐	•	●	◐	•	•	•	◐	◐	●	•	●	◐	○	●	◐	•
<i>CULT</i>	○	●	●	•	●	•	○	○	●	○	○	●	●	●	○	○	○	●
<i>SYST</i>	○	○	●	•	◐	○	•	•	◐	•	•	●	•	◐	•	•	◐	●
<i>VISA</i>	◐	◐	◐	○	○	◐	◐	•	○	◐	◐	◐	○	○	◐	◐	•	◐
<i>RC</i>	0.272	0.293	0.201	0.216	0.142	0.123	0.079	0.091	0.234	0.253	0.163	0.186	0.163	0.243	0.358	0.286	0.193	0.197
<i>UC</i>	0.064	0.077	0.021	0.025	0.048	0.040	0.009	0.015	0.147	0.103	0.094	0.026	0.001	0.082	0.125	0.084	0.043	0.036
<i>U</i>	0.885	0.854	0.876	0.936	0.874	0.865	0.856	0.888	0.912	0.965	0.865	0.868	0.968	0.912	0.982	0.930	0.874	0.886
<i>OC</i>	0.619								0.581					0.693				
<i>OU</i>	0.839								0.890					0.902				
路径国家(地区)	R1: 伯利兹、苏里南、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巴拿马、哥斯达黎加、埃尔萨瓦多、乌拉圭、贝宁、中非共和国、多米尼加共和国、赞比亚 R2: 格鲁吉亚、埃尔萨瓦多、吉尔吉斯共和国、哥斯达黎加、亚美尼亚、贝宁、约旦、蒙古、摩尔多瓦、阿尔巴尼亚、阿塞拜疆、多米尼加共和国、苏里南、白俄罗斯、赞比亚、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R3: 尼日利亚、阿尔及利亚、乌克兰、乌干达、伊拉克、沙特阿拉伯、加纳、津巴布韦、布基纳法索、危地马拉、马里 R4: 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乌干达、伊拉克、乌克兰、加纳、津巴布韦、布基纳法索、阿尔及利亚、危地马拉、马里 R5: 哥斯达黎加、安道尔、冰岛、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R6: 越南、伊拉克、乌克兰、孟加拉国 R7: 阿根廷、尼日利亚 R8: 厄瓜多尔、坦桑尼亚、秘鲁								R1: 安道尔、塞浦路斯、冰岛、哥斯达黎加、波多黎各、约旦、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R2: 中非共和国、贝宁、多米尼加共和国、伯利兹、苏里南、卢旺达、牙买加、埃尔萨瓦多 R3: 埃塞俄比亚、越南、伊拉克、孟加拉国、埃及、阿拉伯 R4: 尼日利亚、哥伦比亚、阿尔及利亚、乌干达、布基纳法索、加纳、坦桑尼亚、马里、赞比亚、津巴布韦 R5: 乌干达、布基纳法索、加纳、坦桑尼亚、危地马拉、马里、赞比亚、津巴布韦					R1: 安道尔、冰岛、塞浦路斯、哥斯达黎加、波多黎各、格鲁吉亚、新西兰、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R2: 马里、贝宁、布基纳法索、多米尼加共和国、苏里南、厄瓜多尔、中非共和国、伯利兹、摩洛哥、赞比亚、津巴布韦、卢旺达、加纳、乌干达、危地马拉、坦桑尼亚、埃尔萨瓦多、阿尔及利亚、牙买加 R3: 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乌干达、摩洛哥、乌克兰、布尔基纳法索、马里、厄瓜多尔、加纳、赞比亚、危地马拉、阿尔及利亚、津巴布韦、越南 R4: 安道尔、乌拉圭、冰岛、哥斯达黎加、马耳他、卢森堡、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新西兰、巴拿马、斯洛文尼亚 R5: 尼日利亚、阿尔及利亚、哥伦比亚、布基纳法索、马里、加纳、乌干达、赞比亚、危地马拉、坦桑尼亚、委内瑞拉、津巴布韦				

注: R1~R8分别为作用路径1~8; *DIST*为地理因素; *ECON*为经贸因素; *POPU*为人口因素; *CULT*为文化因素; *SYST*为制度因素; *VISA*为签证因素; ●为核心条件存在; ◐为核心条件缺失; •为边缘条件存在; ◐为边缘条件缺乏; ○为条件可存在可缺失; *RC*为原始覆度; *UC*为唯一覆盖度; *U*为一致性; *OC*为总体覆盖度; *OU*为总体一致性。

的趋势。究其原因,可能与研究的时段选择长短有关。②大型旅游目的地已有的研究基于综合国家距离框架(Cultural, Administrative, Geographic, and Economic distance, CAGE),认为经济因素对高出入境旅游流的影响显著,其他因素对非高出入境旅游流的影响更显著一些;研究基于 IRRIF 认为小型城市型目的地的高出入境旅游流受包括经贸因素在内的硬实力关系影响显著,软实力关系则对非高出

入境旅游流的影响更加显著。其原因是研究的框架选择存在一定差异,未来研究可基于相同框架进行对比分析。

4.2 结论及启示

本文研究基于 IRRIF 探究区域间“软-硬”关系对城市型目的地出入境旅游流的路径影响模式及时空演变规律,结果验证前文提出的假设成立,结论如下:

1) 在路径数量层面,随着时间的变化,出入境旅游流路径数量简化。由阶段 1 中 6~9 条路径持续缩减至阶段 3 中 3~5 条路径,表明出入境旅游流的影响因素逐渐稳定;但其中存在的不同路径,证实组态结果仍具有复杂性。

2) 在核心条件分析中,硬实力关系(地理因素、经贸因素、人口因素)及软实力关系(文化因素、制度因素、签证因素)中单因素均不构成核心条件,中国香港出入境旅游流路径受多因素共同作用影响。

3) 在前因条件分析中,影响高和非高出入境旅游流的前因条件存在差异,硬实力关系对高出入境旅游流起主导作用,软实力关系对非高出入境旅游流作用较强。其中,经贸因素的存在影响高出入境,经贸因素的缺失影响非高出入境;制度因素与之恰恰相反,制度因素的缺失影响高出入境,制度因素的存在影响非高出入境。

4) 在案例地覆盖的国家(地区)中,高和非高出入境旅游流存在显著地区差异。高出入境中国香港的国家(地区)为欧美发达国家、东南亚临近国家以及中国内地(大陆)、中国澳门、中国台湾签证便利的地区;而非高出入境的国家(地区)为中亚和非洲的不发达的经济体。

5) 在不同时间阶段中,阶段 1 与阶段 2、3 的路径差异较大。表明阶段 1 的分割事件对中国香港出入境旅游流影响较深,即 2003 年中国香港实施中国内地游客“自由行”政策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香港出入境旅游的局面。阶段 2 和阶段 3 的路径具有相似性,可以反映出 2008 年金融危机事件对中国香港出入境旅游流的影响不显著。

总体而言,本研究对城市型目的地中国香港出入境旅游发展得出以下启示:

1) 选择经济贸易往来密切程度高的国家(地区)作为中国香港出入境旅游推广的重点。保持与高出入境旅游头部市场的经贸融入度,提升与非高末端市场的经贸往来度,从而可确保中国香港出入境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具体策略应重视与如中国内地(大陆)这样拥有庞大人口且地理距离临近的头部目标市场,建立起互融互通、更加紧密的全方位经贸和旅游联系。

2) 重视区域间硬实力关系对带动出入境旅游的重要作用,发挥出入境旅游催化剂作用促进中国香港与头部市场区域间硬实力关系的持续深化。同时,更加注重区域间软实力关系建设对非高出入境

旅游地潜力开发的重要意义。充分利用中国香港作为展示中国文化重要窗口的辐射作用,基于粤港澳大湾区平台,扩展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香港软实力关系的全球影响力,努力在“一带一路”倡议等合作机制下推进互利互惠的签证政策,继续在中国新发展格局下保持城市型目的地中国香港在全球出入境旅游市场中的独特枢纽地位。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 入境事务处. 2019年度年报[R]. 中国香港: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2019. [Immigration Department. Annual report 2019. Hong Kong: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2019.]
- [2] Eugenio Martin J L, Campos Soria J A. Climate in the region of origin and destination choice in outbound tourism demand[J]. *Tourism Management*, 2010, 31(6): 744-753.
- [3] 赵多平, 孙根年. 基于文化关联的旅游与贸易互动路径及机理研究——以宁夏与阿拉伯国家为例[J]. *地理科学*, 2017, 37(12): 1815-1822. [Zhao Duoping, Sun Gennian. The interaction mechanism and the path of tourism and trade relations between Ningxia and the Arab countries.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7, 37(12): 1815-1822.]
- [4] 杨洋, 陈艳, 熊洛奕, 等. 综合国家距离对中国入境旅游的影响——基于CAGE距离框架的实证研究[J]. *旅游学刊*, 2022, 37(2): 62-74. [Yang Yang, Chen Yan, Xiong Luoyi et al. The influence of comprehensive country distance on Chinese inbound tourism: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CAGE distance framework. *Tourism Tribune*, 2022, 37(2): 62-74.]
- [5] 赖菲菲, 谢朝武, 黄锐. 两阶段情景下多维距离因素对中国出境旅游影响研究[J]. *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 2021, 37(4): 128-136. [Lai Feifei, Xie Chaowu, Huang Rui.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multidimensional distance factors on China's outbound tourism under two-stage scenario. *Geography and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cience*, 2021, 37(4): 128-136.]
- [6] Menegaki A, Tiwari A, Agiomirgianakis G M. Asymmetries in European inbound and outbound tourism: Normal, luxury or inferior good? Fresh evidence from a quantile regression, forthcoming[J]. *European Journal of Tourism Research*, 2020, 25(8): 1-21.
- [7] Mckercher B, Chan A, Lam C. The impact of distance on international tourist movements[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2008, 47(2): 208-224.
- [8] Nyaupane G P, Timothy D J, Poudel S. Understanding tourists in religious destinations: A social distance perspective[J]. *Tourism Management*, 2015, 48: 343-353.
- [9] Hui S. The efficiency of government promotion of inbound tourism: The case of Australia[J]. *Economic Modelling*, 2012, 29(6): 2711-2718.
- [10] 成英文, 范容廷, 张辉. 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国出入境旅游市场的影响研究——基于主要客源国和目的地国家面板数据的分

- 析[J]. *经济问题探索*, 2014(6): 93-101. [Cheng Yingwen, fan Rongting, Zhang Hui.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RMB exchange rate changes on China's inbound and outbound tourism market: Analysis based on panel data of major source and destination countries. *Exploration of Economic Issues*, 2014(6): 93-101.]
- [11] 陈邦瑜. 国际旅游与国际关系的相互关系辨析[J]. *经济与社会发展*, 2015(5): 7-10. [Chen Bangyu.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ational tour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2015(5): 7-10.]
- [12] 王洁洁. 国际关系及重大事件对出入境旅游的影响[D].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 2011. [Wang Jiejie. The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major events on inbound and outbound tourism. Xi'an: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2011.]
- [13] 王鹏飞, 魏翔. 旅游外交与构建我国新型国家关系问题探析[J]. *现代管理科学*, 2017(12): 109-111. [Wang Pengfei, Wei Xiang. Tourism diplomac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new state relations. *Modern Management Science*, 2017(12): 109-111.]
- [14] Du Y, Kim P H. One size does not fit all: Strategy configurations, complex environments, and new venture performance in emerging economies[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21, 124: 272-285.
- [15] 杜运周, 贾良定. 组态视角与定性比较分析(QCA): 管理学研究的一条新道路[J]. *管理世界*, 2017(6): 155-167. [Du Yunzhou, Jia liangding. Configuration perspective and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QCA): A new way of management research. *Management World*, 2017(6): 155-167.]
- [16] 王铁, 李梅, 孙德健, 等. 农户参与乡村旅游的前因条件与组态路径——基于 QCA 方法的探索[J]. *旅游学刊*, 2021, 36(3): 70-82. [Wang Tie, Li Mei, Sun Dejian et al. Investigating the causal conditions and configurations of farm household participation in rural tourism: A methodological examination based on QCA. *Tourism Tribune*, 2021, 36(3): 70-82.]
- [17] 范香花, 程励. 共享视角下乡村旅游社区居民旅游支持度的复杂性——基于fsQCA方法的分析[J]. *旅游学刊*, 2020, 35(4): 36-50. [Fan Xianghua, Cheng Li. The complexity of residents' support for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based on shared perspective—Using the fsQCA approach. *Tourism Tribune*, 2020, 35(4): 36-50.]
- [18] 张子昂, 保继刚. 多重距离对中国入境与出境旅游流的影响: 基于组态的视角[J]. *地理科学*, 2021, 41(1): 13-21. [Zhang Ziang, Bao Jigang. Effects of multiple distances on inbound and outbound tourism flows in China: A configuration based perspective.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21, 41(1): 13-21.]
- [19] 查瑞波, 伍世代, 孙根年. 城市型目的地入境旅游市场演化差异研究——基于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市内部结构与外部规模分时段辨析[J]. *地理科学*, 2018, 38(10): 1661-1669. [Zha Ruibo, Wu Shidai, Sun Gennian. Differences comparison of urban scale destination's inbound tourism market evolution: The time interval study based on internal structure and external scale in Hong Kong, China and Singapore city.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8, 38(10): 1661-1669.]
- [20] 查瑞波, 孙根年, 董治宝, 等. 引入调节变量的入境旅游对消费物价影响分析——基于1999-2014年香港季度数据的实证研究[J]. *地理科学*, 2016, 36(7): 1050-1056. [Zha Ruibo, Sun Gennian, Dong Zhibao et al. Influence of inbound tourism to consumer prices with moderator: Empirical study of Hong Kong base on 1999-2014 statistics.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6, 36(7): 1050-1056.]
- [21] 包富华, 陈瑛, 查瑞波. 香港国际直接投资与出入境旅游的关系研究[J].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19, 38(3): 27-31. [Bao Fuhua, Chen Ying, Zha Ruibo.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ational direct investment and outbound/inbound tourism of Hong Kong. *Region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2019, 38(3): 27-31.]
- [22] 查瑞波, 孙根年, 董治宝. 1976年以来香港入境旅游关系圈变化及指示性[J]. *地理学报*, 2016, 71(10): 1801-1814. [Zha Ruibo, Sun Gennian, Dong Zhibao. Changes of the Hong Kong inbound tourism relationship circle and its indications since 1976.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6, 71(10): 1801-1814.]
- [23] Fei H T. From the soil: The foundations of Chinese society[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 [24] Yang K S. Chinese social orientation: An integrative analysis[J]. *Chinese Societies and Mental Health*, 1995, 21(3): 19-39.
- [25] 罗家德. 关系与圈子: 中国人工作场域中的圈子现象[J]. *管理学报*, 2012, 9(2): 165-171, 178. [Luo Jiade. Guanxi and circles: Social networks in China. *Chinese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2, 9(2): 165-171, 178.]
- [26] 宋慧林, 吕兴洋, 蒋依依. 人口特征对居民出境旅游目的地选择的影响——一个基于TPB模型的实证分析[J]. *旅游学刊*, 2016, 31(2): 33-43. [Song Huilin, Lv Xingyang, Jiang Yiyi. The effects of characteristics of tourists on Chinese outbound tourism destination choice behavior: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TPB model. *Tourism Tribune*, 2016, 31(2): 33-43.]
- [27] 刘祥艳, 蒋依依, 吕兴洋, 等. 签证便利度对出境旅游的影响——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 *旅游学刊*, 2018, 12: 46-52. [Liu Xiangyan, Jiang Yiyi, Lv Xingyang et al. The impact of Visa facilitation on outbound tourism: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panel data. *Tourism Tribune*, 2018, 12: 46-52.]
- [28] 约瑟夫·奈. 美国注定领导世界: 美国权力性质的变迁[M]. 刘华,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Joseph Nye. Is the United States destined to lead the worl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 Translated by Liu Hua. Beijing: People's University of China Press, 2012.]
- [29] 孙根年, 舒镜镜. 加拿大入境美国旅游流的地域对接分析[J]. *世界地理研究*, 2010, 19(4): 154-162. [Sun Gennian, Shu Jingjing. Spatial relation of inbound tourism flows from Canadian provinces to US State. *World Regional Studies*, 2010, 19(4): 154-162.]
- [30] 孙国霞. 基于旅游市场竞争态的吉林省入境旅游市场研究[J]. *地理科学*, 2020, 40(6): 973-979. [Sun Guoxia. Inbound tourism market in Jilin Province based on the tourism market competitive state.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20, 40(6): 973-979.]

- [31] Ragin C C . Re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Fuzzy sets and beyond[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8.
- [32] Greckhamer T, Misangyi V F, Fiss P C. Chapter 3 the two QCAs: From a small-N to a large-N set theoretic approach[M]. Bingley: Emerald Group Publishing Limited, 2013.
- [33] Greckhamer T, Misangyi V F, Elms H et al. Using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in strategic management research: An examination of combinations of industry, corporate, and business-unit effects[J]. *Organizational Research Methods*, 2008, 11(4): 695-726.
- [34] Fiss P C. Building better causal theories: A fuzzy set approach to typologies in organization research[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11, 54: 393-420.
- [35] Kogut B, Nath R. The effect of national culture on the choice of entry mode[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988, 19(3): 411-432.

Response Path of Inbound and Outbound Tourism of Urban Destinations Under Inter-regional Relationship Influence Framework: Configuration Analysis Based on the Data of Hong Kong, China, from 1997 to 2019

Zha Ruibo, Huang Yue, Du Shuying, Wang Peihan, Xu Jinrong

*(School of Culture Tourism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The Higher Educational Key Laboratory
for Smart Tourism of Fujian Province, Schoo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117, Fujian,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selects data from Hong Kong, China during the period of 1997-2019. The antecedent and consequential conditions are analyzed by using the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QCA) to determine the path of inbound and outbound tourism flow. The research results are as follow: 1) In terms of the number of paths, although it is continuously simplified, it is still complex; 2) In terms of core conditions, all single factors do not constitute core conditions of influence, and the pathways of Hong Kong's inbound and outbound tourism flows are affected by a combination of multiple factors; 3) In terms of antecedent conditions,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the impact of IRRIF, with the hard power relationship playing a dominant role in high inbound and outbound tourism flows and the soft power relationship playing a greater role in non-high inbound and outbound tourism flows; 4) Among the path countries/regions, there are significant regional differences between high and non-high inbound and outbound tourism flows; 5) At the temporal level, the paths of stage 1 are quite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stage 2 and stage 3, indicating that the segmentation events of time nodes have different impact on inbound and outbound tourism in Hong Kong, China.

Key words: Inter-regional relationship influence framework (IRRIF);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QCA); inbound and outbound tourism flows; urban destination